

## 第一章

# 古代亚欧关系的起步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东亚与欧洲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亚欧大陆各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又促进了亚欧之间的交流。不过，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亚欧关系是稀疏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双方的社会经济水平并无太大差距，因而这种关系又是比较平等的。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文明交汇的桥梁

### （一）远古时代的朦胧记闻

据史家研究，早在距今约 3000 年前的中国西周时代，在中国和希腊之间辽阔的草原、半沙漠和山区地带，就散居着许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希腊人称他们为斯基泰人（Scythians，一译西徐亚人），中国人则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部落称为塞人。正是这些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部落建立

了东亚和西欧之间最古老的贸易联系。“塞人部落通过他们的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他们驰骋的吉尔吉斯草原和罗斯草原成了丝绸之路最早通过的地方。”<sup>①</sup>作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支，斯基泰人原居中亚细亚北部，后因萨尔马提亚人的压力，西迁至黑海以北。公元前 7 世纪，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多瑙河下游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地区。一部分南下越高加索山脉，抵达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西北部。斯基泰人曾以克里米亚为中心建立“斯基泰王国”，领有从顿河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地区，与希腊各殖民城市多有接触。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的美丽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远古时代的中西交往史。周穆王是西周第五代国王（约公元前 10 世纪在位），曾西征犬戎，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相传他曾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晋太康二年（公元前 281 年）在今河南省汲县的战国时代魏襄王陵墓里发掘出的竹简古书《穆天子传》，便记载了穆王会见西王母的动人故事：穆王向西王母赠送了珍贵的玉璧和鲜艳的丝织品，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招待，几乎“乐而忘归”。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西王母居处是西方极远之处，西王母则是塞人部落的首领。也有学者认为，“西”字有地理上极西之义，兼有音译，译出了“斯基泰”民族的首音<sup>②</sup>。由此，这一记载成为先秦中国人向西眺望的极限，周穆王也被称作中国古代第一位文化友好使者。

英国著名的东西方关系史研究权威 G. F. 赫德逊在其名著《欧洲与中国》中具体描述了由塞人等草原民族充当中介的从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19 页。

②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欧洲到亚洲的商路，它从今乌克兰和俄罗斯西南岸的亚速海启程，经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穿过中亚大沙漠，到达高峻险要的阿尔泰山。公元前 6 或前 7 世纪一位古希腊商人亚里斯特亚士（Aristeas）曾随西徐亚人（即斯基泰人）到达天山山脉，他的见闻录《阿里马斯比亚》尚有片断保留下来，其中不但记述了在里海和中亚草原间不断往来的塞人部落，还提到在准噶尔荒凉的戈壁沙漠那一边，“有一片富饶的土地，人民定居务农，海水永不结冰”<sup>①</sup>。这可能是欧洲人对亚洲东部最早的朦胧记录。

尔后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 年至前 425 年）等人的记载又证实，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东亚和欧洲之间的确已有往来。希罗多德在摘录《阿里马斯比亚》部分片断时，也自西而东对欧亚草原的各民族作了详细描述，一直谈到天山附近的伊赛顿人<sup>②</sup>。当时色彩艳丽的中国丝绸经过游牧民族的转手贩运已进入希腊诸城邦，成为希腊社会上层显贵的奢侈品。史家从古希腊雕刻和彩陶人像（如巴特依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所着衣服的细薄透明便可推测出这一点。通过这些舶来品，古希腊知道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的国家，以“赛里斯”（Seres）称呼它，便是根据汉语“丝”的译音而取。由于古希腊人地理知识的局限，常把贩丝人和产丝人混为一谈，都称为“丝人”，实际上产丝人才是中国人，而贩丝人则向他们传递了丝国的信息。这样，丝绸贸易成为古代亚欧两端相互接触、认知的主要媒介。

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曾做过波斯皇帝的御医，他在公元前 398 年至前 397 年返回希腊后，写下了一部

①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3 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4 章。

三卷本的《旅行记》，其中有关东方亚洲的记述超过了希罗多德。然而这一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相互间的认识与了解还十分有限，神话和荒诞成分占了不小比重。如克泰西阿斯所描绘的赛里斯人“男高十三骨尺（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而中国人对西部世界西王母的记述则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sup>①</sup>。

## （二）丝绸之路的开辟

公元前 334 年至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希腊—马其顿军队东征，横扫亚洲西部和中部，其东征军几乎叩到了中国的西大门，“亚历山大的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至少在那时已经知道再往东便是赛里斯国了”<sup>②</sup>。可能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阻碍，东征大军最后止步于亚洲中部的药杀水（今哈萨克斯坦的锡尔河）地区和南部的印度河流域。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大帝还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将巴尔干半岛、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西北部合为一个经济文化交互圈，用剑与血开创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和商贸大发展的新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努力推进希腊文明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明的融合。他积极鼓励马其顿人与东方女子成婚，并亲自作出表率，娶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之女为妻。他还通过铸造统一的货币，促使希腊和西亚、中亚及印度之间的贸易更加密切。他在所征服地区建立的一系列“亚历山大城”，为来往的东西方商人提供落脚点和贸易集散地，后来都发展为东西方贸易商路上的重要经济中心。在亚历山大东征前后，不少希腊学者来到

①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 页。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 页。

东方，研究亚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促使东西方文化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尽管在这之前，希腊文明同亚洲东方文明已有接触，但这次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推进了一步，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一种希腊文化与西亚、中亚固有文化融合而成的新型文化——希腊化文化。即使在亚历山大大帝病故后，这种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仍然在其所征服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蔓延时久。

如果说亚历山大帝国的出现曾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障古代亚欧交往通道西半段的畅通，那么随后东方汉帝国的昌盛则有助于这一通道东半段的开通，从而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汉朝的中国是亚洲东部最大的王权国家，被西方史学界称为汉帝国，其控制力达到天山脚下，中亚不少游牧民族纷纷向汉朝称臣纳贡。公元前 138 年和前 119 年汉武帝派遣其侍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不仅了解了中西亚的风土人情，也通过当地人民获悉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信息，开拓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还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的东半段，开始了内地与西域、印度、中亚和西亚的直接交往，加之此前业已存在的中西亚与欧洲联系通道，一条贯穿亚欧大陆东西的交通线便逐渐形成。由于汉王朝国力强盛，威慑中西亚，穿过该地域的商路安全畅通，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的东西方贸易开始有了一条比较固定的陆上路线，即从中国陕西渭水流域起，通过河西走廊由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向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再沿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城，最后通向罗马。这就是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尽管这条通道的大部分——自河西走廊到地中海东岸——途经许多浩瀚无际的沙漠，然而点缀在这些广袤沙漠里的众多天然绿洲却为过往行旅提供休憩、栖身的理想之地，故被称作“绿洲之路”。至于“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欧洲，初见于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1877 年出版的《中国》一书<sup>①</sup>。

关于连接古代中国与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除了上述被称为“绿洲之路”的路线之外，也有学者将本章开篇提到的由塞人等游牧部落自先秦时代就已开辟和使用的商路干线称为“草原之路”。近来中国学术界对所出文献和考古新发现进行研究，认为在张骞通西域以前还存在一条由中国通往欧洲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是一条由民间商旅踏勘而成的“蜀身毒道”，形成时间最晚不迟于公元前 4 世纪。其走向从今成都出发，经云南出横断山，经缅甸抵印度，而后向西北入中亚、中东，抵地中海沿岸，辗转至欧洲。而近来还有日本学者将长安（今西安）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路线引申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显然，在这些“丝绸之路”中，由张骞通西域后开通的那条“绿洲之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最主要的连接东亚和西欧的陆上商道。

### （三）连接欧亚的丝路交往

此后许多世纪里，亚欧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条丝路。汉朝中国人把罗马当作泰西之国，当时的罗马人也把赛里斯国视为亚洲极东国家。公元 97 年汉朝又派使者甘英前往大秦（即罗马帝国），这可能是古代东亚国家希望与欧洲国家建立直接官方联系的第一次正式尝试。可是西亚的帕提亚人（安息人）向甘英使团极力渲染前往罗马的海上风险，劝他们不要前往罗马，结果使甘英使命夭折于波斯湾，事实上从陆路也可到达罗马，帕提亚人无非想控制罗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所以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与罗马建立直接联系。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因此，当时“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sup>①</sup>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以间接方式进行，中亚人和西亚人起了中间商的作用，中国出口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丝织品，此外还有肉桂、大黄等，进口的则是从中间商转来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和羊毛织品。

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于是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sup>②</sup>。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交战，波及西亚和中亚，此后延续几个世纪，致使陆上“丝绸之路”通行艰难，罗马商人不得不弃陆择海。活跃于红海、阿拉伯海的罗马商人于公元1至2世纪到达印度西海岸，再东行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暹罗、扶南和中国，有的则沿孟加拉湾航行，进缅甸后入中国。《后汉书》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和玳瑁”，于是二国“始乃一通焉”<sup>③</sup>。这里的大秦王安敦是指罗马皇帝马克·安东尼。三国吴王孙权接见过这批使者，并向他们询问大秦的情况，还让他们转致对罗马皇帝的问候。但罗马史书上未有遣使赴中国的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冒充使者，以获取商业好处，从海上贩运丝绸。由此就形成了由南中国海经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和印度，横渡印度洋，经波斯湾上阿拉伯半岛或经红海上埃及，由地中海东岸和南岸进入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水陆衔接的商路。在古希腊，中国丝绸通常运至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经染色、刺绣与毛麻织品加工后销往希腊本土。罗马帝国时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

《后汉书》卷八六。

中国丝织品则被拆开重新纺织，为的是从轻盈透明中显示罗马妇女肌体的妩媚。公元 2 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出现在欧洲最西面的伦敦，其风行程度甚至不亚于皇城洛阳。公元 4 世纪罗马历史学家 A. 马赛里努斯曾指出：“原先丝服仅限于贵族穿着，现在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乃至最低的下等人。”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丝绸之路”已远远越出丝绸交易的范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便是通过这些海陆通道经中亚、西亚辗转传往欧洲，西方各国的传统风俗以及欧洲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也在逐渐为东方国家所了解，大大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其中，东亚的中国与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及西罗马各国的商贸和文化往来成为古代亚欧两端相互关系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亚欧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 （一）匈奴西迁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匈奴是古代中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战国时期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末汉初，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势力大盛，统辖大漠南北广大地区。西汉初年，匈奴贵族为掠夺财物和奴隶，时常骚扰汉朝北部边境，并且控制了西域。因当时汉朝经济力量尚未恢复、内部尚不稳定，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均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匈奴人和汉朝商人在边地互市。这种经贸往

玉尔 (H. Yule): 《中国和通往中国的道路》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 1 卷, 伦敦 1915 年版, 第 203 页。

来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 140 年至前 87 年），西汉国力渐盛，决心伐匈奴，通西域。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其初衷就是为联合西域少数民族政权共同对付匈奴。

公元前 133 年至前 119 年汉武帝派将军卫青、霍去病率领大军出击匈奴，经过前后三次大规模战役，击溃匈奴军主力，经西域通向中亚和欧洲的绿洲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受到重创的匈奴内部矛盾激化，贵族们为争夺政权相互攻杀。公元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降服汉朝，以后汉与匈奴维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亲睦关系。直到东汉初年（公元 48 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其民众不断内迁，最后在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开发与汉族相互融合，而留在蒙古草原的北匈奴对南匈奴和东汉政府持敌视态度，在东汉和南匈奴的连续打击下，终于于公元 91 年灭亡。北匈奴的部众一部分归附东汉，一部分后来与鲜卑人相互融合，还有一部分则由单于率领，逐渐向西远迁，进入欧洲。

经过辗转西迁，这部分匈奴人在两个多世纪中经中亚到达东欧。372 年他们征服了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阿兰人，随后继续向西进攻哥特人，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在匈奴进攻下，东哥特人降于匈奴，成为大匈奴联盟中的一个半自治集团，协助匈奴进攻居于多瑙河以北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被迫进入罗马帝国内避难，后不堪忍受罗马帝国的压迫，举行起义。前往镇压的罗马军队在 378 年被西哥特人击败，全军覆灭，罗马皇帝瓦伦斯阵亡，罗马帝国基础动摇。395 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匈奴人则在不断的征战中形成以潘诺尼亚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势力遍及今德国、多瑙河以北的东欧、黑海和高加索等地。422 年至 426 年匈奴人大举入侵东罗

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迫使其每年进贡 350 磅黄金。434 年阿提拉成为匈奴王，匈奴人势力臻于极盛，其疆域东起里海，西至莱茵河，北达波罗的海，南逾多瑙河，成为一个庞大松散的帝国。阿提拉不仅数次进兵拜占廷，劫掠巴尔干，还挥师西进，入侵高卢和意大利。453 年阿提拉率兵返回匈牙利草原，突然去世。翌年日耳曼人大败匈奴人，匈奴帝国遂告解体。10 世纪初，属于芬兰—乌戈尔人一支的马扎尔人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匈牙利境内，与留居于此的匈奴人后裔融合，成为今匈牙利人的祖先。

由上可见，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公元 4 至 6 世纪民族大迁徙，乃是由中国的匈奴人西迁东欧开始的。

## （二）基督教传入古代中国

基督教最早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在 3、4 世纪。3 世纪末罗马作家安诺比斯在《斥异端》一书中，列举耶稣福音已传至中国和印度<sup>①</sup>。但依可信史料，景教东传当为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

景教乃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5 世纪为居住在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所创，故又称聂斯脱利教派。聂斯脱利在 428 年至 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东方教会大主教，因主张耶稣的神性与其人性非一体，被基督教的正统派判为“异端”，予以革职流放。此后聂斯脱利和其信徒流亡波斯，在波斯王的宽待和保护下，于 5 世纪末在波斯形成独立教派，6 世纪末传入中国，名为景教，含有“大教”之意。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该教派派遣僧侣阿罗本等人携带经书来到长安，唐太宗让他们住在宫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5 页。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 页。

中，翻译教典。贞观十二年（638年）又准其在长安建造波斯寺，度僧21人。唐高宗时准其在诸州建寺，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从此景教流行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改波斯寺为大秦寺，这是因为已知景教并非源于波斯，而源于大秦即东罗马。781年大秦寺僧景净等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其盛。但到唐武宗（841年至846年）间，因当政者崇信道教，景教随佛教遭到废禁而趋于衰颓，该碑也埋没土中，一直到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方才出土。

景教在内地遭禁同时，却在当时北方地区获得西辽宽容。辽至元年间，基督教成为中国西北草原游牧民族主要的宗教信仰。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向西辽求援，请其发兵助攻穆斯林。元代对基督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既包括原先流行的景教，也兼指后来传入的罗马天主教。“也里可温”源自阿拉伯语 *Rekh abiun*，转成蒙古语 *Erikhawiun*，意为“奉福音者”，或“福分人”、“有缘人”。元朝统治者对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曾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我对四大先知（指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犹太教的摩西和佛教的释迦牟尼）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位尊者给我帮助。”<sup>①</sup>由此，基督教在华复盛。

一方面是景教再次在中原流行。元世祖之母别吉太后、皇后乃马真氏与怯烈氏均为景教教徒。景教不仅在北方燕京、甘州、宁夏广设传道机构，在南方镇江、杭州、泉州、扬州、温州等地也是教堂遍布。另一方面是罗马天主教入华。元世祖至元卅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孟德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1247年至1328年）抵达汗八里（汗名大都，今北京），得

<sup>①</sup>《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元成宗接见，获准在京传教。1298年至1318年建立教堂三所，并以蒙文译出《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1307年罗马教皇从他的信函得知传教获进展后，决定成立汗八里总教区，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宗总主教。孟氏成为罗马教皇委派到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后在教皇派来的可隆·阿诺尔等教士的协助下，其传教活动由北京向外地扩展，在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开设教堂和修道院，几十年间教徒已发展至三万余人<sup>①</sup>。孟德高维诺去世后，元顺帝与罗马教皇还曾遣使互访。但无论是景教的复燃，还是天主教的初传，都只是昙花一现。它们在14世纪伴随着元帝国的覆灭而湮没。

### （三）蒙古西征与马可·波罗东游

公元4至6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分裂，东北非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红海商路，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均须走波斯湾水路或中亚陆路，基本上被波斯中间商垄断，中国丝绸的价格被抬高到令欧洲人难以接受的水平。由于拜占廷和西罗马两大帝国内的丝绸消费热居高不下，导致金币的过分外流，迫使官方和商人开始设法自己制造丝绸。据传，6世纪中国的蚕卵被印度人（一说为波斯人）放在空心竹管里偷运至拜占廷，先是叙利亚，后是希腊中部成为产丝中心，此后养蚕技术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又从西西里进入意大利等西罗马地区。这样，曾作为欧洲与中国联系桥梁的丝绸贸易开始下降，最终因欧洲蚕丝产量已能满足生产需要而结束了欧洲依赖中国丝绸的历史。赫德逊指出，由于植桑养蚕技术流入地中海地区，就“扼杀了来自中国的丝绸运输，而随之也割断了连接过地中海

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地区与远东之间的巨大贸易联系。”<sup>①</sup>自那时至 13 世纪，欧洲的文献很少再见丝国人、Sinae 或唐家子、中国等字眼。公元 7 世纪起，穆斯林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兴起，其势力扩展到中亚，使本来勉为其难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导致东西方的贸易来往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沿海商路和海上通道转移。关于此后几个世纪的亚欧来往，史书上记载的都是沿海贸易的兴旺与发展，如中国商船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来往，阿拉伯人驰骋于红海、印度洋和波斯湾，拜占廷人则游弋于东地中海和黑海，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活跃在地中海的另一半。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已鲜见欧洲商人的踪迹，常见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 13 世纪蒙古帝国方才改变。

11 世纪，中国北方的蒙古游牧部落逐渐崛起。1206 年，其领袖铁木真统一各部落，被推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率领蒙古铁骑于 1219 年至 1223 年、1236 年至 1241 年和 1253 年至 1258 年间先后三次发动浩浩荡荡的西征，灭亡中亚花刺子模国，推翻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长驱直入欧洲，大败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德意志联军，并一度杀到亚得里亚海，创下了古代东亚人西行的新记录。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朝鲜、日本、爪哇、印度支那一直扩展到欧洲的第聂伯河流域，从而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连成一片。犹如 1600 年前亚历山大东征一样，这次蒙古人西征再次突破了东西文明的闭塞隔绝状态。蒙古统治者挟持其军事上的胜利，将大批欧洲各民族俘虏带到东方，其中具有一技之长者如技师、工匠、翻译被留下为蒙古人服务；蒙古当局在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帝国范围内广建道路、桥梁和驿站，碾平大小王国诸侯的界碑关卡，使一度中断的亚欧陆上

通道得以恢复，为亚欧大陆传教士、使者、商人、旅行家的穿梭来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为蒙古铁骑所震慑的罗马教廷和欧洲基督教国家也希望利用蒙古统治者鼓励商业贸易和对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与蒙古帝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对付伊斯兰势力。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宗教大会，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其停止杀戮基督教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土，并皈依基督教。1246年7月，以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为首领的教皇使团到达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参加贵由大汗的受位庆典，后得贵由复函，函中要求教皇或属下王公前来朝见，11月使团返欧。1247年，教皇又派出伦巴底的多明我僧侣审温为首的使团，提出同样要求，也不得要领而归。但在1248年该使团返回里昂时，同去见教皇的还有两位蒙古使者，他们是突厥人埃伯克和基督徒沙杰斯，由此为蒙古和西欧的友好交往首开记录。1253年法王派教士卢白鲁克出使蒙古，同行的还有波兰、奥地利等地的欧洲商人。卢白鲁克回来后给法王的报告《东方行记》以及前述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后所撰的《蒙古史录》，被后人誉为“《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欧洲人写作的东方见闻录中的两部杰作”<sup>②</sup>。为联合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付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派遣中国景教徒拉班·马·苏马出使欧洲。这对正为数次“十字军东征”<sup>③</sup>屡屡失败而沮丧的罗马教皇和欧洲君主来说，似乎又打开了“重建耶路撒冷王国”的希望之门，因此精通拉

① 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②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③ 1096—1291年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旗下，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的侵略性远征。

丁语的苏马在欧洲各地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法王菲利普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隆重接待。此后罗马教皇和欧洲君主更加积极地向东方派遣教士、使者。而作为中国回访罗马教廷的第一位使者，苏马撰写的旅欧游记也成为第一部中国人详细记述欧洲的见闻录。

在当时来往于东西方的亚欧众多文化使者中，声名卓著、影响最大的还要算游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并留下重要著作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 1254 年至 1324 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可罗和叔叔马飞阿是曾到过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1271 年当他们兄弟俩再次前往中国时，年仅 17 岁的马可·波罗也随行踏上了充满魅力的东方之旅。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登陆后，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前往中国，于 1275 年 5 月抵达元朝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先后仕元 17 年。1292 年，马可·波罗和其父、叔随护送公主阔阔真出嫁波斯队伍，踏上返乡归程，途经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和地区，最后在 1295 年末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威尼斯。1298 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作家鲁思梯谦笔录成书，编为《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此书一问世便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书中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时沿途经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讲述了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杭州、泉州等各地名城的繁荣，盛赞中国物产丰富，文教昌明，还介绍了中国周邻国家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爪哇、苏门答腊、印度等地的情况。

《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它首次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驿政、钞法、印刷、航海和造船，记下了所见到的许多新奇事物。游记虽然遭到不少非议，甚至被指责荒诞不可信，但更多的是使许多欧洲人为东方的富庶、文明的昌盛所倾倒，激发了欧洲航海家、旅行家东航的欲望。西方最早便是通过此书

才知道中国东部海上有一个日本国 ( Zipungu )<sup>①</sup>。哥伦布读到此书中有日本的情况后，便把日本定为他 1492 年远航的最终目的地。1375 年前后出版的加泰隆世界地图也是在参照游记中关于亚洲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绘制的。在新航路开辟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手抄本达 138 种。尽管它对东方繁荣和富庶的描写有点夸张，但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有关亚洲东部最为详尽和可靠的信息，成为地理学家、探险家的必读之书。可以说此前一千多年欧洲对亚洲的认识均不如此书，因此《马可·波罗游记》可谓是亚欧两端相互认识过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 第三节 稀疏而平等的亚欧交往

#### (一) 商品和科技的交流

亚欧商品和科技的交流也许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就已开始，但张骞出使西域促进这一交流是确有历史记载的。如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许多瓜果、蔬菜等新品种，其中葡萄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期间由希腊人从欧洲引入中亚的。同时，桃、杏、肉桂、茯苓等许多水果和药材也随他从中国传到西域，后来又传播到欧洲。

铁器和铸铁技术也是由古代中国传向欧洲的。中国的铸铁技术不仅应用甚早，而且名扬古代世界，公元 1 世纪的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著名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史》（又译《博物志》）中就提到“中国铁”。铸铁技术先是由汉朝逃亡的士卒教给了中亚大宛、安息、康居的铁工，而后再传到俄国，以犀利著称的中国锻造的骑兵刀剑也由安息传到罗马帝国。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24 页。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对中国的输出有玻璃、琉璃、毛麻织品等。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中心。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那里的玻璃制品不断流入中国，其玻璃制造工艺也为中国南方沿海玻璃制造业所吸收。在公元 5 世纪大月氏工匠教会中国人自己制作琉璃前，被汉代人视为宝物的琉璃几乎全部来自大秦。同时，以羊毛和亚麻混纺而成的纹饰繁复的罗马毛麻织品也不断由海路运入中国南方。

公元 8 至 13 世纪，势力覆盖亚欧大陆广袤地域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一方面，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文化是在吸收东西方古代文化丰富营养基础上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在亚欧大陆“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它起到了沟通亚欧两端文明的桥梁作用。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居间传送，将亚欧大陆两端的文化成果双向传播推广。

兼通东西方语言的阿拉伯人翻译了众多欧洲各领域的佳作名著，并将其传播到东方。以古代数学为例，元代秘书监 1273 年收藏的书籍包括《兀忽列的四巽算法段数十五部》，兀忽列是元人对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音译，四巽是阿拉伯文算学。当时元宫廷中有大量阿拉伯人与欧洲人供职，估计此书是通过阿拉伯文转译而来。这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首次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数学书中的命题和解题理论。球面三角法原是古希腊使用的天文计算法，后通过阿拉伯数学家传入中国，设在大都（元首都，今北京）的回回司天台即以此法计算历象。

同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105 年中国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就被人们普遍运用。751 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河畔激战，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中国士兵中包括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15 页。